

中国近现代政党史研究丛书
刘景泉 主编

战后中国政党 与政治研究

纪亚光 秦立海 裴 莘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科建设工程项目



中国近现代政党史研究丛书

刘鹏举 主编

战后中国政党 与政治研究

纪亚光 秦立海 裴 莘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后中国政党与政治研究 / 纪亚光, 秦立海, 裴莘

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 - 7 - 201 - 06385 - 0

I. ①战… II. ①纪… ②秦… ③裴… III. ①政党—
研究—中国—现代②政治—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D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1346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14.625 印张 2 插页

字数: 415 千字 印数: 1 - 1,800

定 价: 36.00 元

对中国政党百年发展的回眸与展望

(代 序)

刘景泉

20 世纪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兴起和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形成的世纪。在现代中国,政党的产生和发展对国家的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发生的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一是结束两千年封建帝制和 19 世纪中叶以来近一个世纪的殖民地制度,二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两件大事都是在政党领导下实现的,这就足以促使我们对百年中国政党的发展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一百年来,中国政党实践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探索过多种形式,最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对人类文明制度的贡献之一,就是在政党制度上,创造并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研究 20 世纪中国政党发展的历史,不但可以使我们系统地把握现代以来中国政党发展的历史脉络,从中认识中国政党发展的规律,还可以得到许多重要的启示,对于 21 世纪中国政党发展的趋势,能够作出更好的把握。

一、20 世纪中国政党产生的社会环境与文化背景

政党作为政治组织,不是从来就有的。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是现代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人类社会没有政党存在的历史远比有政党存在的历史要长。但是自从政党产生以来,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步伐比以前大为加快,其主要表现就是人类政治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比

以前更加丰富多彩。由于政党之间开展的政治斗争和政治竞争，必然要在社会的阶级斗争中反映出来，因此政党之间的斗争不论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是付诸武力，最终都会发展到运用社会阶级力量来解决，这就使公众能够更多地参与和了解政治的本质。由此，政党的存在也就成为国家政治与民众之间的桥梁，极大地提高了民众参与政治的水平和能力，缩短了国家与人民的距离。

当今世界，政党成为处在一国政治核心地带的不可或缺的特殊力量和工具，没有政党的参与，国家机器就不能有效运行。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主要通过政党选举控制议会组织政府来实现。在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党派活动，使一些重大的利益关系首先在资产阶级范围内通过民主的方式加以确立，最终形成了以政党竞争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议会民主政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及阶层要想求得实现自身的利益，没有政党的作用很难取得效果；在发展中国家，要取得民族真正的独立解放和经济政治的进步，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政党的组织领导。至于社会主义国家，一切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政党的作用尤其明显。我国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国家的各项事业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这一现实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应该有发达的政党学，应当对中国政党的历史和存在的问题有更多更深更系统的研究。这对于更好地把握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在此基础上坚持和巩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无疑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

一国何时产生政党，产生什么样的政党，与这一国家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关系密切。世界上许多政党无论是自身素质还是活动方式上表现出来的差异，主要是受其生存与发展的社会历史环境决定的，这就是造成政党差异的文化因素。20世纪中国政党的产生，与西方议会政党有着巨大的差异。首先，中国政党不是伴随着议会政治的确立而建立的，而是适应中国政治环境的需要而产生的。本来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具有浓厚的所谓朋党特征。因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资本大规模的积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不利于现代政

党意识与组织的产生。皇权绝对主义思想的发展和儒家思想文化的倡导,历来中国政治活动家“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只为主地阶级朋党政治创造了条件,农民阶级除了暴力革命,并无其他参与政治的机会。但是这种状况由于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民族危机的加重和中央政治权威的衰落而发生了变化。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国社会和传统政治文明转型加快了步伐,从而为现代政党的产生与合法化准备了阶级条件和活动空间。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国,开始研究西方政党,并且在中国着手组建政党,开展以政党为核心的救国革命活动。孙中山1894年创立的兴中会就有着开拓性的意义。兴中会虽有较浓的会党色彩,但它不以改朝换代为目的,可视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具有政党性质的组织。它不是产生于议会之内,而是产生于社会的阶级斗争之中,为推翻封建制度和殖民地制度,解决中国独立与民主这一历史任务而建立的。康有为创立的强学会,虽然也是为了呼吁改良变革社会而组织的政治组织,但依然带有通过皇权掌握政治权力的地主阶级在野派朋党的性质:它排除李鸿章和张之洞这些所谓洋务派的地主阶级当权派人士,从而加大了中国特色现代化的阻力;它把政治与学术相结合,虽然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特征,但其最终目的不是改良变革社会制度,而是为了排除异己以掌握政治权力,在相当程度上仍属前资本主义的朋党范畴。而作为维新人士的政治联盟和通常被认为是现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政治团体的保国会,虽有比较明确的政治主张和严格的章程规约,有领导骨干和组织形式,但也不脱朋党组织性质。中国政党活动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场所也不在议会,在暴力性的阶级斗争场合。所谓的“戊戌变法”,不过是他们为排斥另一个并不反对现代化进程的皇权权力中心和当权派而开的“第一枪”,从而引火烧身。

在中国,政党的产生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种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条件。在西方,总体上可以说是先进行资产阶级革命,通过暴力革命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然后再在议会内产生议会政党。即西方执政的政党产生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已经确立的社会环境之中,拥有明确的法律地位。而在我国,基本上是先建立革命性政党,由政党领导暴力革命后,仍需继续倚靠强力扫荡旧有的社会制度,然后才进入国家的权

力部门,实现政党的社会理想。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皇权绝对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支持者的势力基础稳固,政党主导下的议会民主制度不能真正建立所致。所以我国现代产生的政党,凡是主张在议会之内实行竞争的,皆因议会政治难以真正确立而走向衰落,有所作为的是那些形成于社会阶级斗争之中,能够发动民众进行暴力性社会革命的政党。中国政党活动的内容和主要手段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而非在议会争取多数实现组阁。由于近代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民族独立和社会民主,在当时中国特殊的国情中解决这一问题很难通过和平的方式,而必须通过暴力性的社会革命来实现。这是中国政党产生时必须面对的重大社会现实,这种社会历史环境决定了中国政党必须把救国救民作为主要任务,才能发展壮大。这种政党与社会制度结合的特殊关系决定了我国政党身份的特殊性,即从政党分类考察,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因为都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首要的任务是完成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因而都属于民族主义政党,而且大都属于革命政党而非议会政党。从世界政党兴起的时间上把握,近代中国政党大体属于世界政党兴起过程中第三批次产生的政党。世界上第一批产生的政党是早期欧美最早确立资本主义议会政治国家在议会内产生的议会政党,主要包括英国、法国、美国等产生的早期政党;第二批次是在早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无产阶级政党,早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由这些共产党领导;第三批次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产生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这批政党主要分布于亚非拉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任务。

上述几个方面的特点,决定了20世纪中国政党的基本类型,决定了中国政党产生的方式与活动方式的基本特征,也决定了中国政党活动的基本内容与发展的基本走向。

在中国,革命型政党初创时期不可能争取到合法地位。这从我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兴中会到中国革命同盟会的建立与发展历程,以及后来各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发展过程可见一斑。从1894年到1905年,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在国内非法活动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都于海外对在中国建

立政党的必要性进行了宣传。维新派创办的保皇党对政党和政党政治的宣传与介绍,起到了为政党正名的作用,在旅外的士大夫阶级中突破了中国传统的“君子群而不党”的观念,也为“君子有朋”的活动奠定了现代化基础。革命派也对会党与政党的差异进行宣传。同样,在资产阶级革命基础向下层群众扩散的同时,也限制了士大夫阶级与下层群众的结合过程。这些活动为在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作了必要的思想和舆论准备,但也留下了朋党型活动和革命不能彻底的隐患。

从1905年到1914年是中国政党规模发展的时期。1905年成立的中国革命同盟会,提出了较为完整的革命纲领,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与资产阶级自由派已经建立起统一的政党。改良派和立宪派也加快建党步伐,积极谋求政党在国内地位的合法化。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积极筹划建立正式的政党组织。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促进了国内外立宪分子的建党活动。1911年清政府颁发了所谓《实行宪政谕》和《准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谕》,取消了对现代合法政党的限制,中国最终实现了政党的合法化。这一步虽然十分迟缓,但毕竟突破了数千年来传统政治文明中朋党与现代政党的界限,树立起一种全新的政治观念,推动了政党的发展,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党制度的选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从1915年到1924年,中国现代化初期的政党发展进入议会政治和革命党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实践阶段。辛亥革命成果化为北京民国政府议会政治之后,在地主阶级自由派与资产阶级自由派共和体制下,多党竞争、分权主义的政治局面很快瓦解,大多数议会型政党停止活动,民国初期的议会政治迅速幻灭。孙中山在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和对中国国民党的状况进行分析之后,提出了“以俄为师”,建立国共合作的新型革命政党的主张,实践以党建国进而以党治国的设想。这一转化,并非中国国民党“全盘俄化”的结果,而是在中西文化交融的基础上的一次实践。事实上,早在1912年列宁即已发现,孙中山“平均地权”的土地纲领实际上既是想超越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民粹主义乌托邦幻想,也是中国企图走美国式农业资本主义道路的彻底民主主义的表现,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同

道。这个资产阶级就是农民。这一思想,实际也是列宁对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走向国际共产主义全球化经济的一种设想。但由于多种因素,这一设想很快被合作化的集体农庄实践代替。共产国际对国共合作以后中国国民革命的指导,也便以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概念,取代了可能走美国式农业资本主义道路的中国农民概念。列宁所说的“民粹主义”,包括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乌托邦社会主义;一是不需要如议会式的中介机构而直接诉诸下层群众的民主主义。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既有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经济设想,也有皇权绝对主义的政治传统。1919年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原是由1913年建立的中华革命党改组而来,已经不是以竞争议会组阁为目标的议会政党,而是以实行民粹主义政治为目标的一个革命党。孙中山在这时期提出并且形成了一党革命、一党建国、一党治国的设想,并且进行了艰苦奋斗。1924年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只是中华革命党的又一次改组。

从1924年到1949年,中国进入国共两党由合作走向对立斗争,和所谓中间党派的体制内资产阶级自由派产生并且逐步纳入反革命体制和革命体制的时期。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登上历史舞台,而且在世界出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政治体系的国际背景下,中国政党也开始新的分化和组合,由此演绎出国共两党的两次合作和长期的对立斗争,中间党派在中国两大政党的对立合作的夹缝中产生并且最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

二、20世纪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

人类社会政治发展中在政党问题上首先出现的是结党现象。在中国,由会党、朋党然后才逐步形成了现代政党政治,而当政党政治发育完善成为一个比较稳定的活动模式时,才形成政党制度。如果一个国家出现了结党现象,不能就认为这个国家存在着现代政党现象,但有现代政党存在也并不等于就进入了政党政治的时代。所谓政党政治,广义上讲就是指一个国家当其各届政府是由政党出面来组织,在分权主义或集权主义议会中的活动也主要是以政党为单位展开的政治活动。

综观各国政党政治发展的历史，政党组织分权主义政府，控制议会、影响以及领导国家的方式在很长时间内是不稳定不成熟的，有时甚至是与国家和社会发生激烈冲突的，有的国家政党之间的关系也是长久不能建立在一个正常规范而有秩序的基础之上，经常发生冲突甚至演化为武力对抗。因此，只有当一国之内有一个政党或者几个政党在进入政治过程、影响利益确定过程、控制利益实现过程各个环节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秩序，进入了政党行为规范运行的时期，而不论是分权主义还是集权主义的政府模式，我们才能认为它确立了某种政党制度或称之为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党运行体制。可以这样认为，政党制度是社会规范化稳定化的产物。

中国虽然是一个政党产生较晚的国家，但在政党制度形态方面，中国曾经进行过多种实验，最终发展演变为当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因为在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政党承担了艰巨的任务，建立民族国家政权的过程同社会淘汰性选择政党和政党制度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合而为一。

从现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政党组织中国革命同盟会的建立到如今，总共只有一百多年的时间，但百年之中，我们的先辈几乎把西方各种政党理论和模式统统搬到我国，“你方唱罢我登场”，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遗产和宝贵的经验。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国不同时期产生的政党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在中国进行了多种制度选择，使中国政党制度形态先后出现四次大的变化，经历四个大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民国初年竞争性政党的实践及其失败。民国初创时期，受党禁放开、同盟会分化、共和政体确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政党群起，曾出现过三百多个政党或政团。这一时期不同党派纷纷提出自己的建国主张。总体上讲，这一时期是中国政党仿照西方议会政党的方式在中国进行议会政治实验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实践虽然因中国政治的特殊性而未能成功，但它给我们许多重要的启示，是中国政党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孙中山提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思想及其实践阶段。从1914年到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实现，中国政党制度经历了一党

建国和一党治国的实践过程。这可以说是中国政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在民初多党竞争失败后，孙中山对辛亥革命中“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现象进行反思，认为要想战胜强大的反革命势力，首先必须重新建立一个有内聚力的革命政党，才能取得革命的成功。他总结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的教训时认为，其失败“非战之罪也”，“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他要求加强党内团结统一，加强组织纪律性，以此实现重建民国的目标。根据这一思想，他成立中华革命党，宣布该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并且将进行程序划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这一主张实际上就是孙中山提出的以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性政党一党建国的思想。这一时期孙中山还对以党建国实现以后革命党如何管理国家提出初步的设想，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一党治国的口号，但实际上形成了一党治国的主张，从而用一党制的新思路代替了先前的多党竞争。1924年，中国国民党“以俄为师”的改组，又引进了共产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意识，使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理论在现实中成为这一阶段中国政党制度实践的一种模式，为后来中国政党制度发展起到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第三个阶段是国民党一党独大与国共两党对立斗争时期。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城市中建立了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反革命体制权力中心，共产党则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进行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斗争。中国进入了两党暴力相争政权的时期。由于中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治传统和国际背景的影响，中国形成了两种意识形态和阶级利益基础不同的政党对立的战争局面。这种形态的两党制是有地盘、有军队、有政权的两党制度，其共同特点是，在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过程中，无从兼顾列宁所关注的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理念。历经25年的合作与斗争，最终以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的胜利和国民党退据台湾而结束。这其中又有许多现象和问题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国共两党既合作又分离的斗争，是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在党际关系上的反映。说明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与经济发展到底具有哪一种根本的特殊性，以及它在解决目前国内“一国两

朝”局面上又有何影响。

第四个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陆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与台湾资产阶级两党制的对峙时期。这一政党制度对峙的形成,既是国共两党内战延续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两岸经济政治发展特殊性在政党制度上的反映。“一国两朝”应该是历史研究采取的一种恰当表述,它和现实政治的“九二共识”具有相同的内涵。反对“九二共识”的人两岸都有,理由是“一中各表”不存在文字记录。但“共识”岂是“记录”?它在历史上相当于“明夷待访”。双方“一中”的“共识”,没有必要时是无需“各表”的,我们反对的是“台湾独立”。如果《中华民国史》的写作止于1949年,恰似为渊驱鱼。《三国演义》电视剧中魏蜀交战,如果是“蜀”字大旗招展,则置“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于何地?

从民国初年的多党实践,到国共两党的合作与斗争,又发展变化为大陆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与台湾先是国民党一党执政后为今日国民党与民进党两党竞争制的对峙局面。纵览百年中国政党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深刻的启示: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由该国国情、国家性质和社会发展状况所决定。各国政党制度的不同,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盲目照搬别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实行“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统治,不仅招致“帝王思想”和“千奇百怪”之讥,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意志,也必然要归于失败。台湾实行的资产阶级两党制并不是西方两党制的翻版,其现行宪法依然是孙中山创意的“五权宪法”,而不是西方通行的三权分立主义宪法,原则上是集权主义而不是分权主义。孙中山明确阐释,他反对三权分立的“国会专制”。五权分立,是将中国古来政制中的监察权与官吏考试权从国会中分离出来,使国会仅保有立法全权,而五院院长则全由总统统率。五院相互制约,最终决策权则仍在总统。至于中国大陆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也不讳言其仍属于无产阶级专政范畴,是中国现代历史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一种必然选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在中国具体实践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和

各民主党派智慧的结晶,在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史上具有独创性和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政党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

三、21 世纪中国政党制度的展望

政党制度属于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不是预言,其能够对未来进行展望,要靠对经济基础现实的分析。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当代经济基础发展的可靠方向,有两点是极其现实的:一是不争论姓“社”姓“资”,二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在台湾已经先走了一步,21 世纪初年大陆也跟了上来。两岸经济的相互依赖,恐怕已是一个很难改变的现实。那么两岸包括政党制度在内的上层建筑的互补,恐怕也是一个可以预期的现实。根本问题似在于让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能否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现代化过程就全球范围而言,也是不必争论姓“社”还是姓“资”的,但其路径还是可以分为两条:一是“富国强兵”,一是“富民强国”。二战和随后在“冷战”中落败的国家类属前者似非偶然。富国者也强兵,强兵必穷兵;强国者必富民,富民先富农。这是 20 世纪初年列宁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中,反复强调美国式农业资本主义道路而否定普鲁士式农业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因。然热衷于前项者,亦多为现代化后进国家。中国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被殖民地化,丧权辱国,治国者与革命者谋求之现代化亦莫不取富国强兵路线。对于“富民强国”,蒋介石将其发展成官僚资本,唯知强兵,不顾农民生死,终至败走台湾。

在公认的现代化国家的 10 项量化标准中,第一项便是农村人口不得超过 15%,紧接着便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占 GMP 的比例。它说明,农村现代化居于其他现代化的首位,而攸关农民利益的离开农村后的去向,是绝对不能被忽略的问题。英国工业化初期的“羊吃人”现象,是向贵族地主利益倾斜的表现。而斯大林所说沙皇俄国“剥农民三

层皮”的现象，更是“普鲁士道路”的极致，是农民参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非理性暴力斗争的来源。为缓解国内阶级斗争危机和追求高额利润，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用剥夺殖民地国家主权，以输出商品和掠夺原料的殖民主义、输出资本的帝国主义手段，谋求在全球性现代化进程的霸权。无产阶级国际革命乃以主张向农民利益倾斜的美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支持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手段。因此，在存在地主阶级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主义和民主革命的农业现代化利益倾向性手段，也是可以调和的。

事实上，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进入商品市场经济的地主和农民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也一直在谋求妥协的可行性道路。洪仁玕的《资政新篇》进入太平天国议事日程虽较晚，但洋务派鼻祖曾国藩和被俘后的李秀成之间的妥协意图却实际存在。孙中山 1894 年上书李鸿章，推销自己从事农业商品化经验的意图也在谋求妥协，不成之后始有次年的广州起义发生。袁世凯称帝以前，孙、袁之间合作意图亦未曾中断，孙氏还曾以袁氏竟能同意“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为怪。国共两党之间的一再合作与分裂，也未尝不是基于此因。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派别或政党，一直不能在革命或执政的现代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由此也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所谓利益倾斜性问题，即是资本主义地租的归属性问题。地主阶级消灭后，问题依然存在。没有资本主义地租也就不存在农业现代化。半部《论语》定天下，半部《论语》致太平；共产党人则是半部《资本论》定天下，半部《资本论》致太平。所谓致太平，就是全面实现公认的现代化量化标准。共产党人无意粉饰太平，也从不讳疾忌医。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完整的民族主义革命之后，定将从传统的“富国强兵”的现代化道路，转移到“富民强国”的现代化路线上来，从而将本属于走向人类自由理论性终端过渡阶段的无产阶级专政范畴的政党制度，逐步转换到后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范畴上来。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优越性

2007年11月15日,我国政府第一次发表了《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白皮书首次全面科学地总结了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五个价值和功能:

——政治参与。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为各民主党派的₁政治参与开辟了制度化渠道,把各种社会力量纳入政治体制,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基础;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广集民智,广求良策,推动执政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积极稳步发展。

——利益表达。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存在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人民内部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存在着具体利益的差别和矛盾。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能够有效地反映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愿望和诉求,畅通和拓宽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协调利益关系,照顾同盟者利益,从而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社会整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求政治制度具备高度的社会整合功能。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以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为前提,又有各民主党派的广泛合作,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整合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目标下,中国共产党紧密团结民主党派,形成高度的政治认同,促进政治资源的优化配置,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和组织社会沿着现代化的方向不断前进。

——民主监督。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有利于强化体制内的监督功能,避免由于缺乏监督而导致的种种弊端。各民主党派反映和代表着各自所联系群众的具体利益和要求,能够反映社会上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能够提供一种中国共产党自身监督之外的监督,有利于执政党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更加自觉地抵制和克服官僚主义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加强和改进执政党的工作。

——维护稳定。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以合作、协商代替对立、争斗,

避免了政党互相倾轧造成的政局不稳和政权频繁更迭，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内耗，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这一制度既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又有各民主党派的广泛参与，能够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

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光辉历程。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互相监督的实践已经充分体现了上述的价值和功能，体现出并且将继续体现出巨大的优越性。这就是：

第一，多党合作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扩大与巩固。

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和核心，就是使全体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使国家政权能够真正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并使全社会人民的利益都受到尊重和保护。因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首先考虑如何使国家权力更加民主化，吸引更多的人民参加国家事务管理，建立一种民主机制来调动社会各阶层公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增强社会主义民主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对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范围，增强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推进其它方面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发挥着其它措施无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群众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忠实代表，也是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代表。各参政党分别代表了不同劳动阶层中的一部分人的利益和要求。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既可体现执政党对国家政治的领导，又保证了各参政党派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使全社会各个阶层、团体的利益和要求得到充分的体现，使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与客观规律，并在实践中得到正确、全面、顺利的贯彻执行。这种党政关系，使共产党和参政党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实现了以诚相待、同心同德，使各民族各阶层人民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得到最充分、最广泛的体现。由此可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先进性和广泛性的重要表现。它给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注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事业的发展。

第二，多党合作有助于国家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实现国家政治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任务。所谓决策的民主化，就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群众能够以各种有效的形式，充分参与政治主体的政治决策过程，使各项重大决策能够集中人民的智慧，充分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真正调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创造性，使党和国家充满活力。决策的科学化，就是政治主体以知识、信息、经验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为基础，借助于人民的智慧，特别是各方面专家以及各种各样的智囊团，实行集体决策、科学决策等，正确准确地反映民意。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一大优势，是其它许多国家不曾具有的特点。参政党派就国家重要问题与执政党共同协商、交换意见、共同决策，对于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具有其它形式和途径无法替代的作用。多党合作制度在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五十多年社会主义实践已经作出充分说明。什么时候执政党在制定重大决策的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参政党的作用，征求各参政党派的意见，吸纳一切好的建议，党的决策就能更好地体现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更加容易贯彻执行。什么时候背离这一原则，排斥和否定各参政党派的作用，就必然造成决策的重大失误，决策的社会代表性、贯彻落实的彻底性将受到严重的损害。多党合作制度对于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推动作用，还体现在各参政党派自身的特点上。除了参政党派各自代表社会一部分群众之外，重要的是我国各参政党派成员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广泛的社会联系：有的在发展教育科技事业中能发挥重要作用，有的在企业管理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有的则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面有建树，还有的在国际交往以及在与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侨的联系上具有优势，便于收集海内外爱国人士对我国重大决策的看法和建议，保证执政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更加全面合理，减少和避免失误。

第三，多党合作有利于国家政权的民主监督。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党制度，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在于它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对执政党和国家权力部门